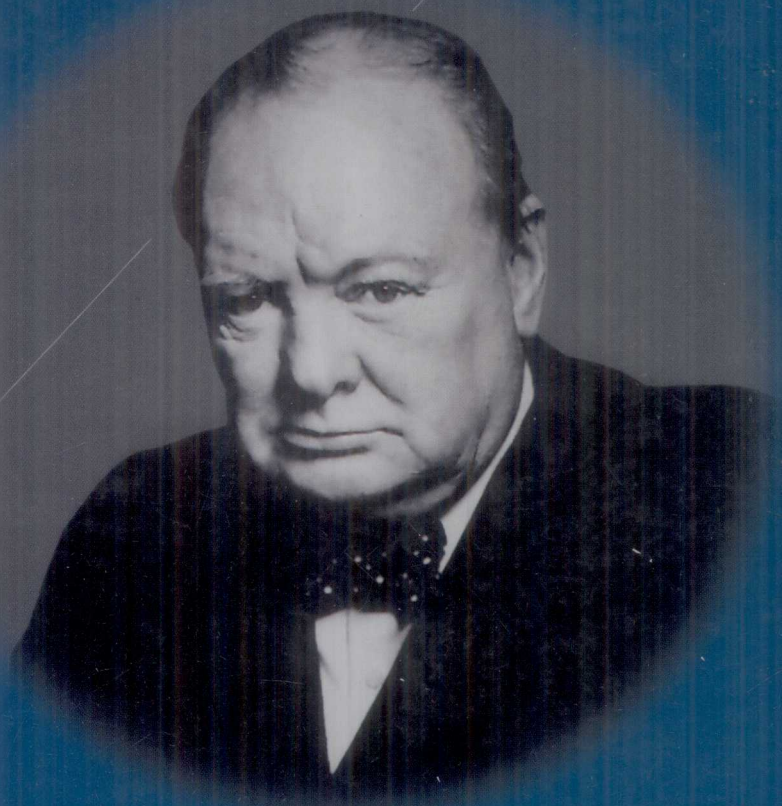


丘吉尔

CHURCHILL

[英]亨利·佩林/著 沈永兴等/译

下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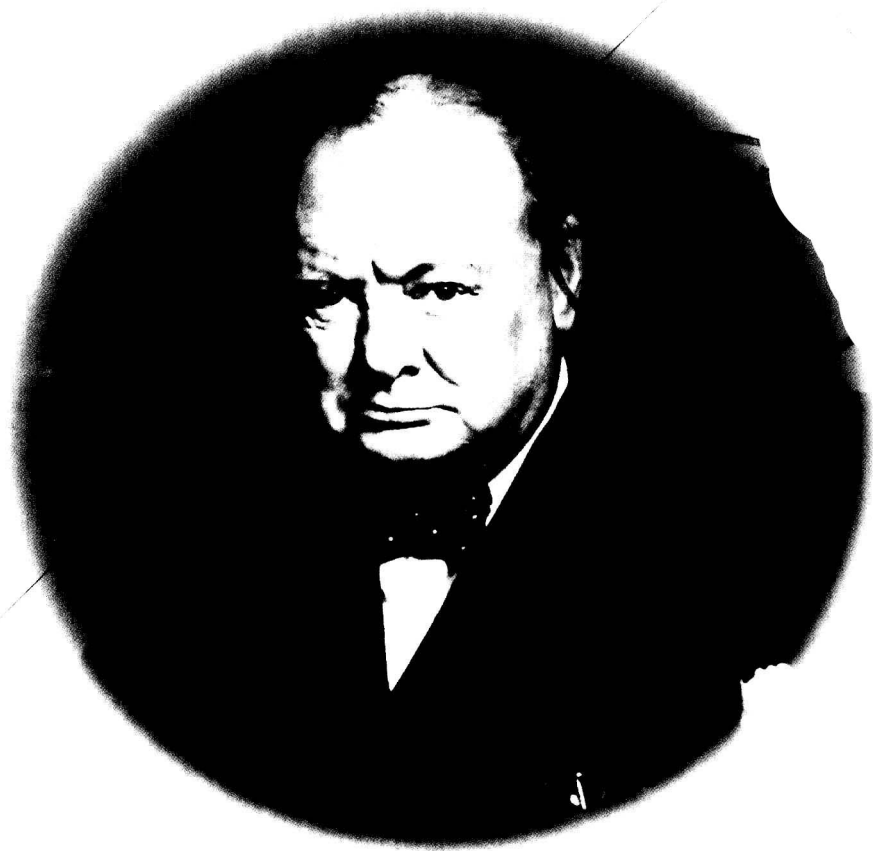


丘吉尔

CHURCHILL

[英]亨利·佩林/著 沈永兴等译

下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丘吉尔/[英]佩林著;沈永兴等译.—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3.8
ISBN 7-80173-212-X

I.丘… II.①佩… ②沈… III.丘吉尔,W.L.S.(1874~1965)
—生平事迹 IV.K835.61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70310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00-3080 号

版权©为 INTERCONTINENTAL LITERARY AGENCY 所有。通过大苹果版权
代理公司,其中文简体字版权已归国际文化出版公司专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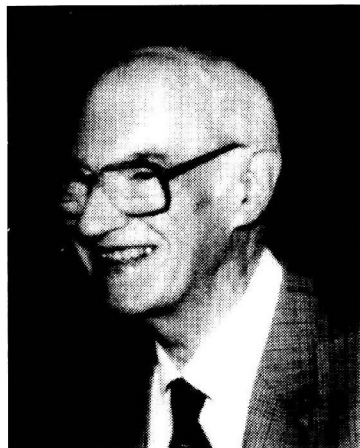
丘吉尔

著 者 [英]亨利·佩林
译 者 沈永兴 等
策划编辑 国文润华
责任编辑 韦尔立
出 版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发 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管庄永胜印刷厂
开 本 787×980 16 开
44 印张 590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书 号 ISBN 7-80173-212-X/K·027
定 价 80.00 元(上下)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100013
电话:64271187 64279032
传真:84257656
E-mail:icpc@95777.com

历史的海洋充
满着各种著名的海
难事件，然而如果
我能找到一条路，
我会比其他任何人
都更坚定地沿着这
条路走下去

温斯顿·列昂尼德·丘吉尔
英国二战时期首相



作者简介：

亨利·佩林(Henry Pelling),

生于 1920 年，

早年曾在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攻读历史，

后来成为牛津大学女王学院的高级研究员。

是一位有一定影响的历史学家，

其著作除政治家传记《丘吉尔》外，

还有：《英国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CHURCHILL



第**3**部·胜利与背弃

1 在野：卷进印度事务 … 359 **2** 通向战争之路 … 381

3 1929—1939 年间的私生活：历史学家和报刊撰稿人 … 417

4 再任海军大臣 … 441 **5** 最光辉的时刻 … 466

6 战争的蔓延 … 493 **7** 危急的一年——1942 … 519

8 从阿拉曼到“霸王”计划 … 538 **9** 从诺曼底登陆日到德国投降日 … 568

10 看守政府和大选 … 600

第4部·余生

1 反对党领袖 ... 619

2 在权力的边缘 ... 640

3 再任首相 ... 656

4 退休生涯 ... 677

结 论 697

译后记 1

第**3**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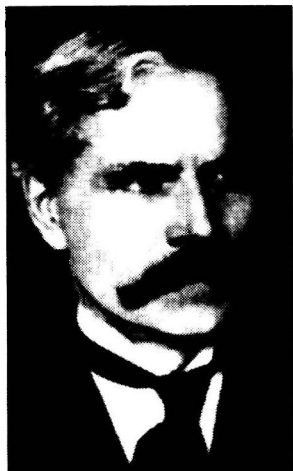
胜利与背弃
(1929—1945)

在野：卷进印度事务

丘吉尔对1929年大选结果和又一届工党政府的组成深感失望；但也产生了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感，因为他又处在反对派的位置上。7月，克莱门蒂娜动了喉部手术，但当她的病一旦痊愈，她的丈夫就动身去加拿大和美国旅行，随同他的有儿子小伦道夫、还有弟弟杰克和杰克的儿子约翰尼，约翰尼跟小伦道夫一样，是牛津大学的学生。“太令人高兴了”，丘吉尔在写给比弗布鲁克的信中说道，“离开了英国，大有一种卸掉令人厌倦和烦恼事务而无官一身轻的感觉。”丘吉尔一行在8月的大部分时间里作横跨加拿大的旅行，他们乘加拿大太平洋铁路的专列进行奢华的旅游，并在几个大城市作短暂的停留，发表演讲，还选择几处风光旖旎的地方观光。9月初，他们到达加利福尼亚，然后东行到纽约州。10月18日，丘吉尔在白宫对胡佛总统进行礼节性拜访。两星



1929年8月3日，丘吉尔由弟弟杰克陪同，乘“澳大利亚女皇”号从南安普敦起程去加拿大和美国



拉姆齐·麦克唐纳。英国工党领袖，英国首相

期后他们踏上归途，离开纽约前往南安普敦，以便出席下院举行的秋季会议。尽管这次旅行使他享受到足够的乐趣，但在加拿大和美国听到的普遍流传的舆论却使他相当烦恼。人们说，英国已趋于衰落，因为有那么多人靠救济为生，而且正由一个“社会主义”政府执政。对后一点，他试图在演讲中打消听众的疑虑，指出拉姆齐·麦克唐纳作为少数党政府首相的地位是否稳固，将取决于是否有“良好的举动”和愿意摒弃在竞选期间及以前所说的“愚蠢的胡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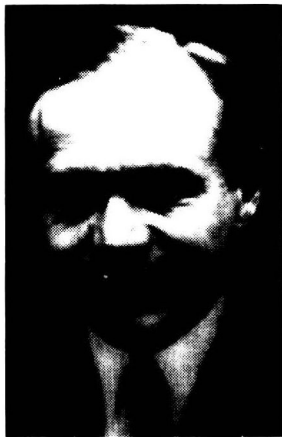
在此期间，大选失败后的保守党内部处于互相指责的气氛中，在各种政策问题和领导权问题上陷入纷争的境地。鲍德温受到报业巨头比弗布鲁克和罗瑟米尔的强烈谴责，这两个人为了使该党在关税改革（其中包括征收食品税）和帝国特惠制这项劲头十足的政策上取得胜利，合力演奏了一首“大英帝国改革运动”协奏曲。丘吉尔表示不赞成，因为他是在保守党拒绝全盘的关税改革政策时回到保守党来的。他仍然希望保守党和自由党实行联合，如果保守党进一步摆脱自由贸易的轨道，那这种联合就不会取得成功。大选之后，他立即出面劝说鲍德温同劳合·乔治进行会谈，他向鲍德温表示担心会出现“自由党—工党联盟”。在1929年7月下院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他表示希望“地面总是比过道更宽敞些”，意思是说，坐在反对派席位的过道下侧的自由党人会看清方向，要保守党合作，而不是与政府联合。这就触怒了保守党内主要的关税改革者艾默里，他的主张正好相反，要保守党同工党保持更友好的关系，而不是同“空谈的自由党人士”结交。按照艾默里的说法，鲍德温“愿意看到丘吉尔和我相互抵消”，但并未考虑到还有来自比弗布鲁克和罗瑟米尔方面的压力。

汤姆·琼斯报道说，丘吉尔在圣诞节那一天“焦躁不安，宁愿同劳合·乔治作伴在一起”。1930年1月，当比弗布鲁克试图争取丘吉尔到帝国改革运动这一边来，但丘吉尔仍无动于衷。像以往一样，每当他丢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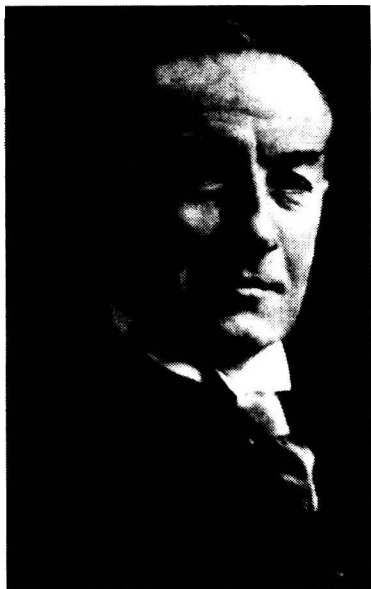
官职下野时,他就郁郁寡欢。根据哈罗德·尼科尔森的说法,丘吉尔在两位老朋友会面时,神色阴郁,使人看来显得“惊人的衰老”。他极不赞同比弗布鲁克的财政计划,而且说他感到“老迈年高,不能为之尽力”,他断然拒绝征收食品税的主张,令人怜悯地抱怨比弗布鲁克说:“马克斯呀,马克斯,你正在破坏我的党。”他们未能获得一致意见就分手了。2月,比弗布鲁克和罗瑟米尔宣布成立“大英帝国党”,开始吸收成员。在赢得公众方面的好感后,他们决定选派50名候选人在英国南部各个选区同保守党进行竞争,其中也包括丘吉尔所在的选区埃平。在此期间,失业人数有所增加,工党政府显然没有制订出什么政策来对付这一局面。奥斯瓦德·莫斯莱爵士提出了某些建设性的建议,但由于遭到拒绝而深感失望,提出了辞呈。

这一结果迫使鲍德温进一步屈从于主张关税改革派的意愿。3月,他走得更远了,表示只要取得各自治领同意,就愿意接受帝国内部各项财政安排的任何建议,甚至可以包括征收食品税,虽然他对此作了限定税,此类建议必须经过公民投票方能予以接受。这项声明得到比弗布鲁克的赞同,但罗瑟米尔没有同意,并独自接管了大英帝国党的指导工作。但两个月后,比弗布鲁克和鲍德温又再次闹翻,鲍德温明确表示,他不打算在下次大选中提出征收食品税问题。

9月,布朗利举行的补缺选举表明,保守党选民中有很大部分人表示大英帝国党的候选人,反对在职的保守党人。10月,帝国会议在伦敦举行,各自治领总理们宣布他们赞成实行帝国优惠政策,这项政策并没有立即为工党政府所接受,但却很自然地增强了比弗布鲁克和罗瑟米尔手中牌的份量。鲍德温不得不迁就这些新的情况。10月,他发表声明,表示接受实行帝国特惠制政策,主张对全部进口工业品征收关税。他认为,在农业方面也可以辅以实行“定额分配制”,因为这项制度会消除任何增加食品费用的必要性。这一主张现在还不能使比弗布鲁克和罗瑟米尔满意,反而还引起来自丘吉尔方面的告诫:“我不能同意对



比弗布鲁克男爵。1942年2月被任命为生产大臣



斯坦利·鲍德温。英国保守党领袖，
1923-1937年间三次任首相

主要食品实行保护性征税措施……请允许我补充说明我的意见，如果你今年还未陷入如此错误的处理和阴谋诡计之中，那末你还能在1931年领导我们的党取得像在1924年所取得的那样巨大的胜利。”

鲍德温与关税改革者之间碰到这样的困难，使他不得不把丘吉尔有可能采取的变节行为，看成是相对说来较小的不幸事件。因此，他冷冰冰地作了答复，告诉丘吉尔说，他是在沉重的压力下才迫不得已而进一步倾向于关税改革的，如果丘吉尔不得不在这个问题上同他决裂，那末“我希望并且相信再也没有什么其他事情会破坏我所十分珍视的

友谊了”。事实上，他接受了保守党的主要代言人罗伯特·托平的劝告，“宁愿冒失去温斯顿的风险，因为这样做可以换取许多人的支持。”

这时，鲍德温的眼睛盯在南帕丁顿进行的补缺选举上。在这里，保守党的正式候选人遭到了比弗布鲁克的帝国改革运动支持者的反对，实际上，后者最终赢得了这场竞争。丘吉尔想知道，就像他对堂兄弟弗雷迪·格斯特所说，他究竟要不要介入进来，发表一个声明阐明自己的立场“放一炮”。格斯特回答说，“既然拿不定主意，那就不要放吧！”这是一个明智的忠告，因为无论如何在今后的几个月里，我们看到失业人数又进一步增加，关税改革的主张甚至为自由党大部分人所接受，这种情况使丘吉尔想抑制保守党全盘支持的论点有了很大改变。仅仅过了几个月，丘吉尔本人就接受了整个关税改革计划，其中包括各项食品征税计划。

但在另外一个问题上，鲍德温与丘吉尔之间也发生了分歧。这就是印度的宪政改革问题，工党政府成立后不久，由印度总督欧文勋爵首先提出的。欧文就是著名的哈利法克斯勋爵，不过这一头衔是他在几年后才继任的。1921年至1922年间，他以爱德华·伍德的名字在殖民

地事务部充任丘吉尔的次官。他是鲍德温的一位密友，并且像他一样坚信，帝国的各种问题应尽可能地在保守党和工党之间以两党均能行得通的方式加以处理。早在1917年，劳合·乔治政府就作出许诺，英国在印度奉行政策的最终目标是取得自治领地位；但1928年由鲍德温派出的、以约翰·西蒙为首的英国议会立法委员会草拟了一个宪政实施计划，该计划并不打算在准备成立地方自治政府方面做更多的事情。它遭到印度国大党的抵制，该党是以印度民族主义者为主的组织，当时由甘地和尼赫鲁父子所领导。

在1929年，欧文认为有必要改善一下印度的政治气氛，应重申取得自治领地位这个目标，并应在伦敦安排一次会议，听取印度人对西蒙委员会所提计划的意见。这一意见得到拉姆齐·麦克唐纳及其内阁的赞同。鲍德温也表示赞成，但与鲍德温商量时，他正好在度假，因而未及与他的同僚们提及此事。1929年10月31日，同时宣布了印度总督关于自治领地位的声明和即将召开所谓“圆桌会议”的消息。然而，英国政界其他领导人对此事的反应极其混乱。在西蒙委员会成立时曾任印度事务大臣的伯肯赫德，强烈谴责总督的声明；在下院，劳合·乔治也对此提出了激烈的批评，认为这不过是一项新的承诺，而不是重申早先提出的主张，并认为在西蒙委员会的报告尚待讨论通过前，不应该这样做。丘吉尔因刚从美国回来，故未发表意见，但他在劳合·乔治发表演说过程中大声喝彩，使那些对鲍德温更忠诚的追随者张皇失措。他还在《每日邮报》上发表文章，对印度在可能预见的将来取得自治领地位的看法提出批评：



劳合·乔治。英国首相，自由党领袖。1863年1月17日出生于曼彻斯特市的一个小学教师家庭，父早丧，家贫

在印度陷于异常严重的种族和宗教纠纷折磨的时候，无疑是

不能给予自治领地位的……我们对印度35000万人的幸福负有责任,而印度的政界人士仅代表了其中微不足道的少部分人,因而不可能赋予这种地位。

丘吉尔反对印度取得自治领地位的行为引起了某些非议,因为他放弃了自己原先有关帝国发展更为自由主义的观点,而找到了一条攻击鲍德温的方便途径,这样他赢得了保守党后座议员的支持,成为党的领袖人物。他对帝国范围内民族主义运动所持的这种态度,明显可以追溯到一次大战后的初期。尽管那时他曾支持过爱尔兰的协定,但他却认为英国已经走到了它所需要的安全防卫的极限,他因此非常敌视任何有关爱尔兰协定条款有侵蚀作用的谈话。在联合政府期间,他强烈反对任何关于英国承认埃及独立的主张,认为尽管可以朝着“完全自治这一广阔的理想”前进,但是绝对不能削弱“英王的统治,不管是在埃及、爱尔兰,还是在印度。”在埃德温·蒙塔古任印度事务大臣时,有关阿姆利则事件的辩论中,丘吉尔尽最大努力为蒙塔古进行辩解,但在私下里却对印度舆论的影射恼怒——诸如,“她”感到“心烦意乱”等等说法——对此,蒙塔古在内阁同僚面前强调印度的利益冲击着英国。当伯肯赫德任印度事务大臣时,这两位好友发现他们自己既基本上赞同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又不鼓励任何迅速实现宪政改革的愿望。在少数党工党政府执政期间,丘吉尔一点也看不到保守党会赞成政策变化的任何迹象,特别是在自由党人表示对此予以关注和反对时尤其如此。

制订对印度的政策并不是丘吉尔个人的职责。他在保守党“事务委员会”中所负的责任是处理财政问题和“监督”已取代他成为财政大臣的斯诺登,我们现在称这个委员会叫“影子内阁”。欧文由于印度的事务受到如此的干扰而心烦意乱,对此丘吉尔已在公开发表的言论中提及,欧文在给保守党上院领袖索尔兹伯里勋爵的信中,请求尽其所能“约束住温斯顿”,他认为,温斯顿的行为“带来不小的危害”。这并不是说,他同丘吉尔在关于尽早促进自治领地位的困难上有什么分歧,而是认为他这种说法是不明智的,恐怕会激起印度民族主义者的愤怒。他在直接给丘吉尔的信中写道:“请不要以为我似乎忘记了你和其他一些人提出的观点,或者认为我实际上与这些意见大相径庭,这里



甘地在狱中度过了六年时光

的问题一半是属于心理上的,同时也是一个伤害感情的问题。”丘吉尔在答复中提出警告说,在他看来,英国的政治形势并不证明欧文的姿态是正确的:“不管事情如何解决,保守党的责任是对社会主义政党既要起到制动闸的作用,又要发挥平衡器的作用。在这方面,无疑我们将和自由党联合行动,虽然角度稍有不同、程度上也有差异。”

但是,欧文并未放弃他试图安抚印度民族主义者情绪的政策。开始时没有取得多少效果,因为印度国大党拒绝参加圆桌会议,并发起了一场非暴力抵抗运动,从而导致甘地和尼赫鲁父子遭到监禁。但圆桌会议的各项计划还是取得了进展,丘吉尔对这一前景越来越感到沮丧。他的老朋友伯肯赫德患了重病,不能在对印度政策的批评中再起什么作用,事实上,使丘吉尔深感悲伤的是,伯肯赫德由于酒精中毒而患肝硬化,于9月底去世。就在这个月初,丘吉尔作出决定,他有责任领导起这场抵制麦克唐纳——鲍德温——欧文政策的斗争,他开始纠集自己的力量。他向比弗布鲁克试探,看看他是否会参加一场维护帝国“光荣与统一”的运动,但他实际上将关税问题排除在外,还补充说,“当然我们必须将自由党人聚集到我们一边。”这对比弗布鲁克毫无用处,他直率地回答说,“我只对一个问题感兴趣。”

丘吉尔下决心就印度问题斗争下去,但并不依靠政治联盟的形

成。他坚决相信,他所采取的行动符合当时客观形势的需要。几乎与此同时,他给鲍德温写信,告诉他“在公共生活中,他越来越关心这件事,要远胜于其他任何事情”。7月和8月,由于他在这个问题上发表了多次演讲,结果收到了“来自我们旅居印度的英国人源源不断的来信”,这些信件向他透露了人们对欧文政策的忧虑。丘吉尔仍然希望,鲍德温会放弃他对印度问题的支持,但这毫无实际效果。11月中旬,由于鲍德温曾在夏季度假期间谈过丘吉尔所著的《我的早年生活》的样本,便在给他所信任的戴维森的信中说,他的同事“又再次成为1896年的骠骑兵中尉了”。

就在这个时候,圆桌会议开幕了,抵制在印度实行激烈的宪政改革的新组织成立起来,名曰“印度帝国协会”。该组织的成员由保守党的“死硬分子”和在印度的文职官员中的退休人员所组成,尽管丘吉尔并不是其领导成员或参与委员会的工作,但却成了在12月12日于伦敦举行的第一次会议的主要发言人。他声称,他相信自治领地位仍是一个遥远的目标,而马上实行自治将意味着“或者是印度的专制主义……或者是使残酷内战重新爆发”。这些话说得很强硬,而他发表的声明更强硬,声明说,“甘地主义及其它的所有主张,迟早会被制服,而最终将被粉碎,试图用猫肉来喂老虎是不会使其心满意足的。”这些话在英国和印度立即掀起轩然大波,拉姆齐·麦克唐纳说:

彻头彻尾都是有害的……除了表达帝国政府及其属下的人民之间那种已经陈旧过时的关系之外,毫无别的内容。声明对现代每一个政治运动都闭眼不见,在对那些要在政治事务及抱负方面我们需要加以启蒙的人民方面,表现得固执傲慢。

自此之后,他与鲍德温的关系终于破裂,在保守党中的领导地位也为期不长了。1931年,当下院辩论圆桌会议有关事项时,丘吉尔发出了严肃的警告,他说,政府的政策只能导致不列颠与印度走向完全的脱离。这是一种悲观的说法,因为他已开始认识到,这不是一个易于引起英国公众舆论关注的问题:

人们都为失业或税收所困扰,或也为体育和犯罪的新闻所吸